

结网录

朱新夏 著

南开大学出版社

结 网 录

来 新 夏 著



21000617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南 开 大 学 出 版 社



1000617

结 网 录 来新夏 著

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

(天津八里台南开大学校内)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天津牛家牌印刷厂印刷

1984年10月第1版 1984年10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9.375 插页2

字数217千字 印数1—7,000

统一书号: 11301·5 定价: 1.55 元

前 言

《结网录》是我 1980 年至 1983 年间所写文章和札记的选录。它主要反映我近年来学习清代历史并作些研讨工作的情况。我从八十年代始就立志想在学术工作中有点成绩，但事与愿违，四年一瞬而过，我并未达到预想的目标。如果恰如其分地自我评论一下，充其量只不过读了点杂书，写了点札记；或者为了加深认识，作了点缀辑资料、归纳问题的工作而已！按时髦术语说：只是进行了一点二次文献工作。唯一可以自我安慰的是做了点开拓笔记杂著这一史源的尝试，对有些问题作了点描述性说明。因此，这本集子只能名之曰《结网录》。

“结网”的出处见于《汉书·董仲舒传》所引古人的格言：“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这句格言包含着一种教人循序渐进，网成自能得鱼的寓意。正因为这句格言很合乎我这个才拙学疏者的口味，所以早在中年时期就曾以“结网”的态度沉浸于典籍杂著，随手札录，乃成四册，自题为《结网录》。不意后竟被毁于丙丁，所余寥寥，多涉及近代史事，遂甄选十一则入于拙著《中国近代史述丛》（齐鲁书社 1983 年出版），别署《结网小录》，借识依恋之情。现又哀集八十年代以来所撰诸文，仍题《结网录》，

其意在说明诸文不过如网之成目。至于网之良窳与否，有待质之高明。自己能用网得鱼固佳，设他人能借此得鱼尤感跃然而心喜。但从这些拙文看来，我这四年的结网工作并未织成一幅好网，甚或容有失扣的地方，出现了“漏网”，也许我所织的仅是一面小网，尚未足洒向江海。但我将一如既往，不计其功地结网、结网……以弥补前此的不足并纠正错结。至若师友教正，实企翹之！

朱新夏

一九八四年三月于南开大学北村遼谷

目 录

前 言	(1)
清代考据学述论	(1)
清代前期的商业	
——读清人笔记札记之一	(20)
清代前期的商人和社会风尚	
——读清人笔记札记之二	(43)
清代前期地主阶级结构的变化问题	
——读清人笔记札记之三	(61)
清代前期江浙地区的饮食行业	
——读清人笔记札记之四	(79)
从《阅世编》看明清之际的物价	
——读清人笔记札记之五	(85)
鸦片战争前的地主与农民	(98)
周亮工和他的杂著	(115)
清宫廷学者高士奇和他的著作	(119)
王鸣盛学术述评	(124)
王贞仪传	
——兼资文武、文艺旁通的女科学家	(146)

林则徐与禁烟运动·····	(153)
徐寿的生平及其成就·····	(171)
林则徐谈地方志的一封信·····	(180)
读故宫藏林则徐书札手迹·····	(185)
一本近代民族资本家代表人物的自谱·····	(195)
“著论肯为百世师”	
——读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	(203)
《历代人物年里碑传综表》清人部分校记·····	(209)
清人笔记随录十篇·····	(227)
《冈小纪》(227)	《平圃杂记》(232)
《板桥杂记》(236)	《阅世编》(241)
《三冈识略》(246)	《广阳杂记》(251)
《三异笔谈》(255)	《明斋小识》(258)
《冈杂记》(261)	《嘉清录》(265)
清人北京风土笔记随录九则·····	(273)
《昌平山水记》(273)	《京东考古录》(274)
《燕台笔录》(274)	《人海记》(275)
《宸垣识略》(276)	《藤荫杂记》(276)
《燕京杂记》(277)	《京师偶记》(278)
《京尘杂录》(278)	
清代康雍乾三朝官方整理古籍例目·····	(280)
清语汉解拾零·····	(286)
继续加强清史研究·····	(292)

清代考据学述论

考据并非清代所独有。它萌芽于对历史文献的致疑，肇端于汉代学者的整理文献典籍。自汉以来，考据一直为历代学者用作整理历史文献的一种技能或方法。直至清代，考据成为一种专门之学^①，作者蜂起，著述丛出，而称一时的“显学”。它随着历史发展的要求而出现各具特点的不同发展阶段。本文只就其渊源、发展与特点诸问题略作述论。

(一)

考据一称考证，是历来学者所普遍使用的一种整理历史文献的技能或方法。它可能起源于对文献的致疑。如儒家学派的子贡就怀疑过有关纣的罪恶记载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②子贡怀疑纣没有象文献记载上所说的那样坏，只是由于干了点坏事，于是许多罪名就加到纣的身上。它启示了对文献记载进行考信的想法。

孟子对典籍中所记武王伐纣的战况也认为不完全可靠。他说：“尽信书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仁人无敌

① 《清史稿》卷四八六《汤球传》：“汤球……从(俞)正燮、(汪)文台游，传其考据之学。”

② 《论语·子张》。

于天下，以至仁伐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①孟子直接指出《尚书·武成》篇这一文献典籍中描写武王伐纣战况的“血流漂杵”是夸大，只能相信十分之二三。这种思路就是考据方法中的理证法。

有所怀疑，就要思考探求，就要考据，所以考据工作便由此而兴始。

考据方法正式用于整理历史文献当自汉始。自秦火以后，图书文献荡佚颇多。汉兴，若干重要典籍有所谓今古文之分。其中古文多为壁藏，各家解释，众说纷纭，为了各求其是，便需要进行考据。司马迁在撰写《史记》时就感到说法不一的难于处理，如说：“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②这是司马迁对有关黄帝的各种不同文献资料加以考据后所作的结论。司马迁为此首次提出了要以儒家经典作为考据文献的指导标准，那就是：“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③

东汉王充在所撰《论衡》一书中，有《书虚》、《儒增》、《艺增》和《语增》等多篇，例证古书的不信实。这比司马迁所涉及范围更广，考据工作更趋具体。郑玄是东汉末年以毕生精力用考据方法整理文献典籍的著名学者。郑玄一生的主要学术功绩就在这方面，所以《后汉书·郑玄传》论赞中就专门标举此事作为评论郑玄这一历史人物的主要内容。范曄在论赞中说：“汉兴，诸儒颇修艺文。及东京学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滞固所禀，异

① 《孟子·尽心》。

② 《史记·五帝本纪》。

③ 《史记·伯夷列传》。

端纷纭，互相诡激，遂令经有数家，家有数说。章句多者，或乃百余万言。学徒劳而无功，后生疑而莫正。郑玄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芜，刊改漏失，自是学者略知所归。”

郑玄的这种考信工作是对经学进行的一次较大规模的整理。它奠定了儒家经典的权威地位，同时也对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学术影响。清代乾嘉学者所谓的考据学就是以“郑学”为旗帜；又由于郑玄是东汉人，便以“汉学”高自标榜。

晋朝由于古文尚书亡佚，出现了伪古文尚书，加以有了新的地下发掘如汲冢竹书之类，更是各说纷杂，莫衷一是，为以后考据学的发展提供了课题。由于当时距离某些古籍时间日远，文辞立意较难理解，于是逐渐兴起了古籍注释工作，即所谓“义疏之学”。

唐代学者把过去各家对儒家经典不同的文字和解释重加研究。有的自认为寻求到了一种正确解释，即既能发挥前人见解，又合于时代需要，这就是所谓“正义”，如孔颖达的《周易正义》；有的重新用文字解释旧注，设法疏通各说，以求所谓“是”，便称为“注疏”，如贾公彦的《仪礼注疏》。另外如陆德明的《经典释文》，据其自序说是“古今并录，经注毕详，训义兼辩”之作，因而被《四库全书总目》推为“研经之士终以是为考证之根底焉”^①。但当时盛行的还是自南北朝即已开始的“义疏之学”，因而“义疏之学”便被后世称为“唐学”。“唐学”在考据方法上比“汉学”有发展，那就是由以正文字是非为主到以正立说之“是非”为主。

宋代学者认为唐人采用众说解经是驳杂，所以力排义疏，主

^① 《四库全书总目》卷三三《经部·五经总义类》，《经典释文》条。

张不引经据典而简化诸说，要求“不役心于文字，直阐发乎精神。”朱陆分别主张“格物致知”和“六经皆我注脚”，主张从众说中悟出一种自认为较好的说法，于是便成为与“义疏之学”不同的“义理之学”，进而大谈“性理”和“道”，所以又称为“理学”或“道学”。由于它昌盛于宋，后世又称它为“宋学”。但是，尽管如此，考据方法仍被一些学者所运用，如晁公武、陈振孙的考订图书，欧阳修、赵明诚夫妇的考录金石，郑樵、王应麟的征考文献，甚至朱熹也撰著考异之作^①。考据方法依然不废。

明承“宋学”绪余，提倡理学，经宗朱学，朱注成为科举考试的敲门砖。王阳明等继承了宋学中的陆派，又参入禅学，崇尚空谈，学者可不必多读书，考据之学见衰。明学末流形成的这种不甚读书袖手空谈的坏风气，不仅脱离学术实际，进而脱离社会实际而流于空疏。即使如此，在一部分学者中还在运用考据的方法，如胡应麟的《四部正讹》三卷，“皆考证古来伪书”^②之作。

由汉至明，考据方法在学者手中不绝如缕地运用。它在曲折发展过程中有所丰富。明季学术虽流于空疏，但却为清代考据学的勃兴提供了一项必要的前提。

(二)

清代考据学是在考据方法源远流长发展基础上，针对明季学

① 朱熹以《阴符经》虽为唐李筌所伪托，“然以其时有精语，非深于道者不能作，故为考定其文”，撰《阴符经考异》一卷；又对《周易参同契》，“凡诸同异，悉存之以备考证”，而撰《周易参同契考异》一卷。

②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二三《子部·杂家类》七，《少室山房笔丛》条。

风空疏的时弊而兴起。它有着不同特点的不同发展阶段，大致可分为清初、乾嘉时期，道咸时期和清季四个阶段。

清初是清代考据学的发轫期，其有开创之功的是顾炎武和黄宗羲。他们目睹明学空疏之弊，大声疾呼，提倡“经世致用”与“博学以文”。他们首先批判了宋明理学的无根柢。顾炎武主张经学即理学，认为没有什么独立的理学。他说：“古今安得别有所谓理学者。经学即理学也。自有舍经学以言理学者而邪说以起。不知舍经学则其所谓理学者，禅学也。”^①黄宗羲也“尝谓明人讲学，袭语录之糟粕，不以六经为根柢，束书而从事于游谈。”^②在顾、黄诸人的大力倡导下，于是就经学本身追古求是之风日甚，竭力主张大读唐以前古书以穷经，带动了许多学者向风而起。乾嘉学者汪中曾说：“（清代）古学之兴，顾炎武开其端。”^③这正反映了这一历史真实情况。顾、黄之学之所以被称为“古学”，是对“宋学”的一种攻击。古学家抨击用朱注猎取功名是世俗之学，所以标榜自己是“古学”而称对方为“俗学”^④。

顾、黄考据范围涉及甚广。《清史稿》称顾炎武的博涉是：“炎武之学，大抵主于敦华就实。凡国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仪象，河漕兵农之属，莫不穷究原委，考正得失。”又称黄宗羲是：“上下古今穿穴群言，自天官、地志、九流百家之教，无不精研。”顾炎武还自称以“旁搜博讨，夜以继日”的精神来“抉剔史

① 全祖望：《顾亭林先生神道碑》（《鲒埼亭集》卷一二）。

② 《清史稿》卷四八〇《儒林传》一。

③ 《清史稿》卷四八一《儒林传》二。

④ 黄宗羲尝谓“不为迂儒，必兼读史，读史不多，无以证理之变化；多而不求于心，则为‘俗学’。”（《清史稿》卷四八〇《儒林传》一）。

传，发挥经典”^①，并主张“采铜于山”^②，涉猎于最原始的资料。

顾、黄不仅博涉，而且还提出了一套比较完整的考据方法。如顾炎武即曾自述其考据方法说：“列本证、旁证二条。本证者，《诗》自相证也；旁证者，兼之他书也。二者俱无，则宛转以审其音，参伍以谱其韵。”^③这段话具体提出了考据的三种基本方法，即除本证、旁证已明标其目外，最后所说的以“宛转”、“参伍”之法来审音谱韵，实际上就是一种理证法。本证、旁证与理证构成考据方法的基本内容。他还提出“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④的考据门径，成为后来考据学家所遵循的从声音、训诂以求经义的入门手段。不仅如此，顾炎武还把书证与物证，即文献与实物紧密结合起来考察。《清史稿》本传曾记其事说：“所至之地，以二骡二马载书，过边塞亭障，呼老兵卒询曲折，有与平日所闻不合，即发书对勘；或平原大野，则于鞍上默诵诸经注疏。”^⑤这种方法更有异于前代学者键户读书，袖手论学的空疏之弊。

顾炎武还反对孤证。主张必须以足够的原始论据来求得确当的解释。他的学生潘耒就推重其事说：“有一疑义，反复参考，必归于至当；有一独见，援古证今，必畅其说而后止。”^⑥近代学者梁启超也称道这一方法说：“论一事必举证，尤不以孤证自足，

① 顾炎武：《金石文字集序》（《亭林文集》卷二）。

② 顾炎武：《与人书》十（《亭林文集》卷四）。

③ 顾炎武：《音论·古诗无叶音》（《音学五书》）。

④ 顾炎武：《答李子德书》（《亭林文集》卷九）。

⑤ 《清史稿》卷四八一《儒林传》二。

⑥ 潘耒：《日知录序》。

必取之甚博，证备然后自表其所信。”^①这种赞誉也说明了清代考据学的初期确是植根于博而考信征实的。

顾炎武的治学范围、治学精神和方法等方面都对清代考据学有着重要影响，特别是他所提出的一套考据方法，即使乾嘉时期以考据学自相标榜的“大师”也没有象顾炎武概括得如此完整。更值得注意的是顾炎武的考据不是为考据而考据，而是为了“经世致用”，所以他和黄宗羲等人就在讲考据的同时也讲义理，没有标榜汉宋门户，后人评论他们兼采汉宋是符合事实的。这一点正是清初考据学与乾嘉考据学不同的分水岭。那些自立“汉学”门户的乾嘉学者虽然承认“国朝诸儒究六经奥旨与两汉同风，二君实启之”^②的事实，而吸取顾、黄的许多精华部分，但却没有把顾、黄推到清代考据学开山的地位而采取了排斥压抑的态度。江藩的《汉学师承记》是树立汉学门户的公开宣言，全书八卷，赞誉了“汉学”家的学术成就，而对顾、黄始则置其传记于第八卷，抑于书尾以示非学统所在，继而公然抨击“两家之学，皆深入宋儒之室，但以汉学为不可废耳，多骑墙之见，依违之言，岂真知灼见者哉！”^③

尽管如此，但在顾、黄影响下，学术界确是出现了一批从事历史文献典籍考据纂辑的学者，如马骥的治古史、胡渭的治地理、阎若璩的治古文尚书、梅文鼎的治算学……，他们解决了学术上长期疑难的问题，做出了重要贡献，成为向乾嘉考据学过渡的桥梁；不过，他们也产生了某些消极影响。即以阎若璩而论，

①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② 江藩：《汉学师承记》卷八。

③ 江藩：《汉学师承记》卷八。

所著《古文尚书疏证》经过博征详考，根据充足的证据，解决了长期未决的伪古文尚书问题，成为“古学”的代表作，为清代考据学奠定了基础。这是值得肯定的一面。但是，阎若璩提出的“一物不知，以为深耻，遭人而问，少有暇日”口号，不仅有高自标榜之嫌，而且也引导后人走向烦琐细碎，如他自称竭二十年之力始知“使功不如使过”一语出处、考明张良在鸿门宴上的座次和自署杂考之作为《碎金》等等，正足以说明他已经失去了顾炎武等“经世致用”的精神，趋向于烦琐，对乾嘉考据学起到了消极的引导作用。

乾嘉时期的考据学是清代考据学的第二个发展阶段，也是清代考据学成为“显学”的年代。它以惠栋、戴震为其代表，大张“汉学”旗帜，正如江藩所夸示那样：

“经术一坏于东西晋之清谈，再坏于南北宋之道学。元明以来，此道益晦。至本朝三惠之学盛于吴中；江永、戴震诸君继起于歙。从此汉学昌明，千载沈霾，一朝复旦”^①。

这一阶段已经由清初考求经义的经世致用发展到借穷经证史来抬高汉学，崇古求是。考据领域也从单纯字义、训诂及辨伪的考订发展到对典章制度、天文历法、地理金石、氏族年齿、名物故实……几乎无所不考的地步。以惠栋为代表的一批乾嘉学者提出了以汉人许慎、郑玄为师，揭橥“墨守许郑”的口号，建立师承家法。由于他们主要崇拜郑玄，所以称为“郑学”。郑玄是东汉学者，所以又标榜称“汉学”。他们标举考据学作为本学派的特色，所以又被加上“考据学派”的恶谥；由于他们处在乾嘉时期，又称

① 江藩：《汉学师承记》卷一序。

为“乾嘉学派”。正是在这一阶段才把汉学、考据学派和乾嘉学派赋予了同一内涵意义。至此，以考据为主要方法的“汉学”达到勃兴的鼎盛阶段，所谓“自乾隆中叶以后，海内士大夫兴汉学而大江南北尤盛”^①和“乾隆以来，家家许郑，人人贾马，东汉学烂然如日中天矣”^②的种种评论皆系指此。

乾嘉考据学之大盛而被目为一派的原因。一方面正如梁启超所分析那样：“因矫晚明不学之弊，乃读古书，愈读而愈求真解之不易，则先求诸训诂名物、典章制度，于是考证一派出。”^③另一方面则是现实政治方面的原因。自康、雍以来，许多学者怵于文网周密、大狱迭兴，便在文化专制主义的残酷压力下，以古音古训来追求古经籍的解释与说明，认为借此可与现实不甚关联而明哲保身。乾嘉时期统治者在意识形态统治方面既感到前此单纯高压并非最好良策，而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可能已发现考据一道可从阴柔方面达到统治的目的，因此有意识地推波助澜，提倡这种学术，遂使考据学弥漫一时，成为学术领域中具有重要甚至优势的地位。而在社会生活方面的原因则是由于康、雍、乾以来较长期安定繁荣的温床，使这一批学者能够安然恬适地沉迷于故纸堆中，使之成为得以存身的政治避风港。

考据学派兴起，名家辈出。虽然他们都在“汉学”的旗帜下，但因各人学殖不同、致力不同而互有小异，称大宗者是吴派与皖派。其特点，即如近人章炳麟所说：“其成学著系统者，自乾隆朝始。一自吴、一自皖南。吴始惠栋，其学好博而尊闻；皖南始

① 魏源：《武进李申耆先生传》（《魏源集》上页三五八）。

②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③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戴震，综形名，任裁断，此其所异也”^①。

吴派是指以惠栋为首的一派学者。他们的治学态度是“谨守家法，笃信汉儒。”它的中心宗旨是求古，而汉学最近古，所以惟汉最好。这种风气的开创者惠栋曾明确地表示：“古字古言，非经师不能辨，……是以古训不可改也，经师不能废也。”他把汉儒的解经抬到与经平行的地位。他说：“汉儒通经有家法，故有五经师。训诂之学，皆师所口授，其后乃著竹帛。所以汉经师之说，立于学官，与经平行。”^②

因此，吴派的特色就是“凡古必真，凡汉皆好”^③，开启了一派学者求古而不问是非的风气。对于这种学风当时已有所评议。《四库全书总目》中曾指出说：“（惠栋）其长在博，其短亦在于嗜博；其长的古，其短亦在于泥古。”^④ 皖派传人王引之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见异于今者则从之，大都不论是非。”^⑤ 说明当时人也不能完全接受这种盲目崇尚汉儒的方法。

吴派的传人以王鸣盛为代表。王鸣盛是乾嘉学派中与钱大昕、赵翼并称清代三大史家之一。王鸣盛曾“从惠栋问经义，遂通汉学”^⑥，但一直自承与惠栋处于半师半友关系中。他是吴派中的死硬派。他一力主张尊郑，把郑玄推到宗师的地位。他说：“两汉经生崛起，传注麻列，人专一经，经专一师。直至汉末有

① 章太炎：《清儒》（《章氏丛书》中篇检论）。

② 惠 栋：《九经古义·述首》。

③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④ 《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春秋类》。案：经部主要由戴震裁定，这也代表戴的思想。

⑤ 王引之：《与焦理堂书》（《王文简公集》卷四）。

⑥ 《清史稿》卷四八一《儒林传》二。